

● 杨和亭 著

红 日 照 北 平



前 言

杨和亭同志，是生长在陕北、战斗在陕北，建国后献身于祖国边疆甘肃、新疆和黑龙江，以及陕西建设的老一辈革命家。

在陕北，这块当年被革命烈火映红的土地上，杨老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斗争。他由一个基层工作者在硝烟中成长为一个又一个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陕北大部分地区有过他战斗的足迹。他既投身于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又置身于高层的运筹帷幄里，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80年代，离休后的杨老壮心不已，言传为志，以陕北革命斗争为主，撰述了许多回忆文字。这些回忆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富有教育意义，为有关各方重视。本书辑录了其中主要回忆文章加以出版。

延安精神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马文瑞同志曾说：“我们所谓延安精神，就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13年这个时期的精神”（《在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杨老这本回忆文集，正为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研究、宣传、发扬延安精神提供了一份向导和教材。循着历史的征尘将有助于我们对延安精神的透视和颖悟。基于此，我们选编了这本书，希望帮助大家尤其是从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通过对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

了解,在跨向 21 世纪的征途中,把延安精神的火炬燃得更红,举得更高。

1935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领导中国革命,使陕北的革命烽火燃烧得更旺。杨和亭同志曾多次亲聆毛泽东、周恩来的教导,鼓舞了他革命的斗志和信心。故将这本文集取名《红日照陕北》。

本书在杨鸿章和窦振邦同志主持下,由高中哲同志编辑,张醒民、谭敦林、航宇等同志参与完成出书工作。由于我们经验和水平不足,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

1996 年 6 月 25 日

目 录

上编 人物寄怀

纪念毛泽东

- 记毛泽东的几次接见…………… (1)

怀念周恩来

- 1947年春周恩来在绥德、子洲…………… (15)

革命教育家徐特立

- 1993年在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上的发言…………… (24)

- 附录：“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 (29)

回忆刘志丹…………… (34)

战友习仲勋…………… (44)

好同志 好领导

- 怀念张德生…………… (52)

鞠躬尽瘁公仆心

- 曹力如在陕北…………… (59)

怀缅谢绍安…………… (63)

下编 史事追踪

陕北燎原星火

- 中国共产党陕北组织的诞生和成长 (70)
- 安定东区烽火 (81)
- 三打“黄儿子” (94)
- 永坪、瓦窑堡会议 (107)
- 从西北工委到绥德分区 (111)
- 神府特委和苏维埃 (121)
- 驱逐何绍南的斗争 (127)
- 保卫河防 保卫陕甘宁 (143)
- “三三制”政权的实施 (145)
- “分田分地真忙”
 - 绥德分区土地改革纪事..... (160)
- “百万工农齐踊跃”
 - 绥德分区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 (171)
- 杨和亭简历 (187)

纪念毛泽东

——记毛泽东的几次接见

“十一月，是冬天，江西上来个毛泽东；
毛泽东来势力重，他后带百万兵……”

——陕北民歌

从1935年10月到解放后的数十年间，因工作上的关系，我曾多次见到毛泽东主席，聆听过他的亲切教诲。他那高大的形象，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远见卓识，雄才大略，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历久不忘。现在，仅就记忆所及，追述几次会见中的片断，借以保存史料，并抒发我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之情……

在瓦窑堡中央工作会议上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纵横驰骋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12月初旬移住瓦窑堡（今子长县）。

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的消息，象春雷，声震万里；象春风，暖透大地。人们争相传告，一片欢腾。多年来，奋

战在陕北高原上的革命军民，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无限敬仰。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我们身边，怎能不使人欢欣若狂呢！

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对陕甘宁苏区的建制作了调整。撤销了原陕甘晋省委和军区，成立了陕甘边省委、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和陕北省委、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我所在原属陕甘晋省委领导的第一分区党委（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延水6县，我当时任分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同时撤销。陕北省委通知，要我到省委去另行分配工作。

12月初我到瓦窑堡，住进陕北省委机关所在的米粮山。省委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等对我说：“中央决定神府苏区改为神府特区划归中央直接领导，决定派你去神府特区工作，担任特委书记，谢绍安为特委常委、红三团团长，张汉武（当时化名秦玉）为特委常委、团特委书记，张江全任宣传部长；调王兆相到红军大学学习，调张晨钟到中央党校学习”。省委负责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坚决回答说：“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纵有千难万险，也能克服。”我愉快地接受了党的指派，准备到神府去开展新的斗争。

过了两天接到通知说：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神府特区的工作，要我们去参加。我们非常激动，随即我同王达成、张江全一起去参加会议，谢绍安和张汉武当时因事未能参加。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会议地点在瓦窑堡对面的齐家湾。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外，我记得还有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邓发、张浩

等领导同志。我们一进门，毛泽东就站起来，热情地同我们握手，问这问那。我含着热泪，望着毛泽东高大魁梧的身躯，慈祥的面孔，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心中念叨着一句话：毛主席呀，可见到你了！

张闻天等同志也都和我们一一握过手。张闻天主持并宣布开会，他说：“今天，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神府苏区的问题，杨和亭同志也来参加会议。”毛泽东接着讲话，他声音宏亮，态度从容，一字一句，条理分明。我记得他首先谈到国际形势，大意是：当前法西斯十分猖狂，意大利最近侵占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亚非许多民族的侵略、吞并和压迫更严重了。因此，国际斗争空前剧烈。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导致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讲到国内革命的发展形势时，他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华民族的步子加快了。因此，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国内阶级矛盾降到了次要和从属的地位。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正在蓬勃地开展，促成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在三个条件之下，组织抗日救国政府，说明国内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急速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激起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蒋介石是个卖国贼，他把张学良东北军调到西北来“围剿”陕甘宁苏区，他一定会孤立起来。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变化后，向我们说明了党的政策任务：现在的情况是，民族危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口号就是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要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

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建立人民共和国！对国民党军队，要加强宣传工作，争取左翼和中间力量抗日；要提出“剿苏区，打内战，这真不上算，打日本，救家乡，才是男儿好汉”，“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谈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时说，对地主，没收他的土地和财物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分浮财。

当会议转入讨论神府的工作问题时，他一字一句地讲：“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那里的形势现在很紧张。”他满怀期望地看着我们说：“你们去后，一定要把党员动员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要深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还会遇到困难，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坚持斗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最后笑着对我说：“派你去当那里的特委书记，那里是你们独立作战的地区，革命重任在肩啊！”

我细心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感到心情无比激动。他的话，牢牢铭刻在我的心坎，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不可估量的动力。

此外，毛泽东还讲了许多政策问题、方法问题和具体问题。比如去神府前的具体工作找贾拓夫（当时是白区工作部部长）联系；军事上的事情，由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刘志丹负责解决；保卫工作同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商量；还特别嘱咐我们要加强对红军的领导，壮大红军的力量。

主席讲完话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讲了话，作了指示。

会后，我们搬到中央机关去住。贾拓夫多次给我们详

细地谈了去神府的具体工作任务和方法；刘志丹对如何坚持人民战争，如何巩固与扩大红军部队作了指示；王首道就保卫工作向我们作了具体的安排。他们的话都给我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说真的，任务我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但心里总是像潮水一样不能平静。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的叮嘱，同志们的希望，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我担心能不能把神府的工作搞好，会不会辜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一再鼓励我：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鼓起勇气向他们保证：“对，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不久，我们到了神府，开展了那里新的斗争。

在杨家岭的重要谈话

1944年春天，为了解绥德教育工作情况，毛泽东约我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面谈。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亲聆了他关于教育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早已引起毛泽东的关切。正好我们绥德分区开了一个教育会议，讨论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研究了教育方针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口号：即教育要同劳动结合，教育要同社会教育结合，教育要同政府结合，教育要同家庭结合。不久，我去延安开会，新华社的记者来采访，我就把绥德分区教育的情况作了介绍。

出乎我的意料，《解放日报》很快就在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的标题，报道了我们的经验。我感到十分惊讶，

内心忐忑不安，我们搞的工作并不怎么好，竟引起党和政府这样重视！接着，边区教育厅长柳湜突然来找我，他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这篇报道后，很感兴趣，打电话让我叫你到他那里去谈一谈”。这一来，我心中更加不安，觉得惭愧，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好，拿什么去向毛主席汇报呀！

柳湜陪同我到了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毛泽东一见，就向我们伸出温暖的手，我双手紧紧地握着主席的手，连忙向他问好。他让我们在办公厅会议室就坐，毛泽东首先说：“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是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接着就要我谈谈几个结合的问题，并要我谈详细点。

当我将绥德分区教育工作的情况和教育会议是因何提出四个结合的问题作了汇报，并请他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指正时，他言简意赅地说：你们提出的几个结合是新的提法，是重要的问题。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了这一条，就不会弄错方向。其他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经他点明，我似乎懂得了一点。但对他讲的这一段话的深刻意义，当时我并未全部理解。

毛泽东又说：“教育方面现在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解决。”他回过头来对在座的胡乔木说：“乔木同志根据这些情况，写一篇文章吧！”

毛泽东和我这一次谈话不到两个小时，因为话题集中，时至今日印象犹深，记得清楚。尤其使我深受教育的是，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基层工作的经验，善于把群众的

智慧集中起来，加以提高，使之成为指导我们革命的理论。

我回到绥德后，立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整顿和加强了教育干部队伍，使得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

在枣园的一天

1944年12月下旬到1945年1月中旬，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代表大会。那时，绥德分区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由地委书记习仲勋和我带队，我们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盛会。

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边区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同党、政、军领导同志共集一堂，讨论边区的建设问题，总结交流了工作经验，加强了党政领导部门与边区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会议无论对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或是对提高我们干部的经济建设理论水平，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著名讲话，就是这次会议群众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是异常繁忙的。为开好这个会议，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在会前了解了全边区以至各抗日根据地的丰富材料，而且在会议进行期间也用了大量时间，召集代表们座谈，力求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具体指导

我们总结工作经验。

记得大会期间，毛泽东专门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枣园约各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一天，我们吃过早饭，沿着延河，顺着去三边的大路，来到枣园，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室内春意盎然，毛泽东热情欢迎大家，谈话在无拘无束中开始了。毛泽东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他没有向我们问一般的情况，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都是来自地方工作的同志，你们的工作，群众赞成的有哪些？不赞成的是哪些？

这样一问，我们原先准备的那一套，就用不上了。大家就根据自己工作中的体会，你说一条，他说一条。等大家发言以后，毛泽东概括地说：“群众表示赞成的，恐怕有那么10多条。比如干部经过整风，作风民主了；搞了大生产运动，减轻了群众负担，没有要饭吃的了；禁止抽大烟，禁止赌博，改造二流子，社会风气好了；婚姻自主，废除了买卖婚姻；消灭了土匪，群众能安居乐业等。这些都使群众满意。他们感到不满意的方面还有个别干部深入群众差，工作方法简单片面；有些问题群众还未接受，宣传工作搞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还有懒汉，要求改造二流子等。”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开导的语气说：“群众不满意，说明我们工作没有做到家。如果你们按政策办，给群众交待清楚，群众会接受我们的政策和意见的，这些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没有正面批评，而是用启发的方式，提高我们认识，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

法,进而增强我们的政策观念和群众观念。

在谈到劳动英雄的作用问题时,大家谈了许多。毛泽东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三条:第一条是带头作用,第二条是骨干作用,第三条是桥梁作用。对每一条的内容,只用几句话,就把意思说得既准确又完整,大家惊叹毛泽东的伟大才能。这些,毛泽东后来都写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了。

因为我们是做地方实际工作的干部,为了帮助我们做好各个地方工作,毛泽东这次还专门给我们讲了实行“三三制”和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党周围,党外人士总是多数,党员人数总是少数。因此,很多工作要靠党外人士来做,不能光靠党员来包办。搞“清一色”倒容易,但“清一色”不容易成功啊!还说:统一战线,这是一大法宝。我们党员是少数,要靠党外人士做工作,要和党外人士搞好团结。

毛泽东海人不倦地给我们讲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大多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才能完成党的任务,才能实现党所制定的目标。

生产建设是谈话的重点,毛泽东讲了很多,就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的主要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要我们认识到,当时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根据农村分散的特点,对生产和供给要采取“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家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为了减

轻农村人民的负担，坚持战斗，对付荒年，一切部队和机关，一律要参加生产。

中午，毛泽东留我们在枣园吃饭。吃的是大米饭和猪肉，这在当时就是顿丰盛的美餐了。他同我们一起吃，边吃边谈，他是一个幽默而富有风趣的伟人，在他身边毫不觉得拘束。饭后稍事休息，又接着谈，谈到教育和消灭文盲的问题，几乎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都谈到了，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的时候。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我作为绥德地区选出的代表、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大会。

4月23日，代表大会在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为主席团，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陈毅的《大江南北的战争》的报告，因印有正式文件，只作了简短说明；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讲了两个半天。对上述报告和讲话，代表们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根据报告和讨论，大会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最后，选出了党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七大”举行期间，我虽然没有机会和毛泽东个别接触，但是他在大会期间的活动，他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对革命的重大决策所起的作用，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

忆。

在会议举行的 48 天中，除了关于政治报告的说明外，毛泽东还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间还作了几次讲话。这些报告讲话，始终贯穿着团结胜利的精神。在开幕词中，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形势，强调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毛泽东挥手高呼：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更是不计较个人恩怨。如对王明问题，当时代表们拒绝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反复给大家做工作，大会上讲，小会上谈：“王明的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把王明问题进一步引伸到党内团结上来，他教导我们说：“山头嘛，有呵。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这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农村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分割有联系。因此，只有承认山头，才能逐步缩小山头。”他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给大家做工作，要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同时，为解决党内团结问题，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一个月左右的高干会议。毛泽东总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为党内团结和党内民主

操心备至。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共同努力指导下，党的“七大”终于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的历史功勋，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已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明，并将在我国革命的史册中，永放光芒。

在 1956 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1956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我受中共新疆中央分局的委托（当时我是中央分局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前往北京参加会议。4 月 25 日我乘飞机赶到北京时，方知来迟了一步。我当即赶到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委员，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已经到齐，会议即将开始了。

我一到会场，毛泽东立即同我热情握手，并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赶忙回答：“是从新疆来的。”这时，我本来要向他问好和作些自我介绍，可是还未等我开口，他接着说：“你就是 1935 年冬季中央派去神府工作的杨和亭同志。”我回答：“是，是。”我仔细地看他老人家，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还像 20 年前那样神情焕发，那样神采奕奕，那样和蔼亲切。从 1935 年到 1956 年，20 多个春秋已过去了，他仍然清楚地记着我的名字，我佩服他老人家惊人的记忆力！

会议开始，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当时，还